

跨国公司与 中国的 开放政策

〔美〕王念祖 〔中〕滕维藻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跨 国 公 司 与 中 国 的 开 放 政 策

主编 [美]王念祖 [中]滕维藻

南开大学出版社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开放政策

〔美〕王念祖 〔中〕滕维藻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300071 电话34.9313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马家店印刷厂印刷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1/32 印张：9.625

字数：238千 印数：1—1200

ISBN7-310-00295~4/F·49 定价：5.95元

导　　言

近10年来，四个现代化这场伟大的革命迅速地活跃在中国大地上，其标志之一是中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之一——自我封闭——已经开始被对外开放所逐渐取代。在这一取代过程中，跨国公司这支50年代末崛起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巨大力量已经发挥，并将加强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方向，除了取决于中国国内外原有的客观经济基础以外，还取决于另两类因素：一是跨国公司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二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进程。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对跨国公司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这两个密切关联的问题颇感兴趣。

与上述两个问题有关的值得探讨的范围很大。为方便起见，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跨国公司的理论与实践；二，东道国和母国对待跨国公司的政策和经验；三，作为东道国的中国有关对外开放的政策与经验。这三方面构成了本书的三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在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跨国公司进行概述。该部分涉及当前跨国公司的发展和主要学派的观点。首篇由英国里丁大学的约翰·H·邓宁教授撰写，该文提出了在变化了的世界环境中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跨国公司理论的基本问题。这些变化包括：世界主要大企业继续走向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增长的双向国际投资，跨国公司活动地理格局的变迁，以及日益增强的对跨国公司的和解态度。结果是作者为他的综合理论作了雄辩的维

护，认为折衷理论可以为解释各种现象提供一个理论框架。这不足为奇，因为邓宁的综合理论原本是由许多家综合程度较低的理论综合而成。如同供给与需求之类的一般理论一样，几乎所有的特殊解释都可以纳入综合理论。与此同时，由于这个综合理论框架内已首次明确考虑到环境的许多变化，因此可以说，邓宁这篇论文代表了他对其综合理论的重大充实。

在观察到同样的环境变化之后，陈荫枋的论文试图回答一个重要问题——跨国公司对世界发展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是否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跨国公司对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基本上是一个积极因素。这和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学者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不过，该文主要观点是不应无视跨国公司与发展中东道国可能发生的矛盾——这些矛盾源于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不同，源于诸如剥削价格的制定，限制性商业行径等活动，或者源于跨国公司一再不大关心欠发达地区。应该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如何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以便利用跨国公司的活动能量。

冼国明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一基础是从西方经济思想，特别是内部化理论派生出来的。尽管内部化理论有其局限之处，但它肯定了跨国公司在当代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主要作用。人们看到，这种和比较利益法则相一致的分工加速了所有国家的发展，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通过实行一种长期的对外开放政策来参加这种国际分工。

贝尔曼更进一步指出，政府对待跨国公司的政策宜根据跨国公司不同方向和战略类型来制定。由于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效益导向型的跨国公司有其不同的战略，政府就应该制定不同的政策，最有效益地利用各种类型的跨国公司。文章的结论之一是，跨国公司的行为则常常是无效的，甚至是阻碍生产的，因为行动守则既大笼统又太专一特定。然而，西川润、埃本罗斯、卡尔等人对此持相反的观点。

在知识产业方面，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电讯，发展中国家对

于跨国公司的政策处于两难境地。罗奇的文章着重论述了这一点。在信息处理部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滞缓，而发达国家在该部门创新步伐快捷。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相对开放的政策，允许从跨国公司那里接受技术的传播，民族工业就可能经不起占优势者的竞争。另一方面，如果建立壁垒阻碍这种形式的技术传播，国内技术就会很快过时。事实上，无论是在人力上还是在硬件上，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大量的浪费性投资，这些投资限度内，又要懂得如何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本国获益。在税收优惠方面，对外国企业的过度的税收优惠在根本上将加重东道国本国企业的负担，从而对本国企业不利。作者还中肯地提醒东道国的决策者：一个经济上健全的企业——当然包括外资企业——并不需要借助于补贴和高度的市场保护就能自立。

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国际方面的观察图景。世界上其他国家对待跨国公司的方法、对跨国公司实行的政策的经验对中国十分有用，就象中国的教训对其他国家也十分有用一样。

维特索斯论述了当代技术的重大变化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部门结构上的特点以后，他指出，由于技术的重大变化，在80年代前半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研究与发展集约程度较高的部门，其外国直接投资自始至终处于相对不足的状况。相比之下，那些研究与发展集约程度中等的工业部门（具有更多成熟的技术投入）和服务部门却得到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一点对中国在开放过程中制订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将有启发性。

罗伯克认为，美国政府管理进出的国际直接投资的特征在于它的“无门”政策，而不是“开放”政策。除极少数例外，没有特别机构或手续来审查外国资本的流出和流入。在考虑了有着不同战略的美国私人企业投资行为的发展趋势和模式以后，他得出结论，中国对美国投资的吸引力大小取决于中国在经济、政治、政策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状况。美国投资决策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是

有利可图。资源导向型跨国公司将权衡各东道国的吸引力。市场导向型跨国公司必须有能力汇回一部分利润，尽管东道国也要求它们为之赚取一些外汇。进口替代工业最终会转换为出口工业。

纳甘地的文章的主题是80年代印度宣布的新的开放政策。他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并不是唯一走这条道路的发展中大国。文章以印度工业政策演变为脉络，考察了印度对外正在迅速地被淘汰。与此相对应的是，这方面的国际安排措施也落后于微电子革命所带来的问题和机会。

西川润的文章对跨国公司的消极面作了有力的提示。他不仅认识到跨国公司和东道国及母国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而且认识到，跨国公司和当前的世界危机存在着联系。在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下，跨国公司利用转移价格和限制性商业行径，以及跨国公司对国外子公司的控制，这些都决定了上述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作者认为，世界危机不仅包括发达国家的失业和滞胀，而且包括发展中国家日益恶化的债务形势和赤贫状况。对此，他提出一个处方：适当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在国际社会、民族国家、当地政府三个层次上来控制。

大卫·西赛普《跨国公司的投资及其对东道国的利弊》一文指出，东道国在一定的特定条件下，可以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其条件之一是：东道国既要懂得如何把吸收跨国公司投资所付出的代价控制在该国可接受的开放政策。尽管他写作本文时尚为时过早，还不能说清印度人是如何接受开放政策的，但对当初限制外国投资和限制对引进技术的偿付政策影响的分析，反映了当时存在着争论双方的不同估计。早期政策的积极效果是推动了本国企业家和技术能力的成长，其消极的一面，尤以国内市场垄断势力的存在和工业技术计划的停滞现象为最明显。许多观察家十分称赞泰国的发展模式，而帕拉萨塞特则相反，他慨叹泰国社会完全依赖跨国公司，贸易依赖、金融和债务依赖、技术依赖

和文化依赖，都是跨国公司控制当地生产过程和削弱当地资产阶级的结果。跨国公司的技术统治特别表现在限制性的合同安排，高收费和跨国公司对泰国渗入的影响。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市场渠道；进口、财务和管理以及股权投资控制泰国的重要工业部门。给中国的启示是，中国现行的将其经济与跨国公司再联系在一起的某些活动，如若超出某一临界点，就会造成对跨国公司的财务和技术依赖的危险，和通过竭力仿效跨国公司生活方式，将会导致中国传统崩溃的危险一样。

匈牙利经验比较引人注目，这除了它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全国改革之外，还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较早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国家。西麦论述了匈牙利和跨国公司发展联系的演变过程：战后初期，对跨国公司的观点深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的影响，跨国公司被视为垄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匈牙利并未把它作为一个潜在的经营伙伴或可能利用的组织形式来研究。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加和匈牙利对西方贸易的扩大，要求有一个观念上的新的突破。由于与西方进行贸易的情况基本上令人满意，而且政治环境也比较有利，因此匈牙利与跨国公司建立了多种合作形式。1986年以来，由于深化经济改革和建立了一套新的有利于跨国公司资本流入和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法规框架，这种合作发生了质的变化。不过，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仍然是有限的。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是共同的。埃本罗斯和卡尔的文章指出，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恢复了其重要地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这种投资的作用有了新的看法。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提高了金融以外其他资金来源的吸引力。和贝尔曼较早的观点相对立，埃本罗斯和卡尔强调跨国公司制定国际行为守则的有益性，认为这种守则可以为国际直接投资服务，如同关贸总协定之如国际贸易。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已能为双边投资合同的谈判和解释提供了指导准则。它可以改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气候，缓解当前债务危机。

第三部分直接论述中国的开放政策。

王正宪的文章反映了战略选择上的考虑因素。他肯定进口替代战略是欢迎外资战略的一部分。鉴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影子价格难于计算以及投资的间接影响，项目评估时，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是否具有实用性，作者对此提出质疑。尽管文章总的结论是同意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会超过消极作用，但作者和许多外国观察家一样，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仍待改善。

诺莫夫从第三者的角度论述中国开放政策及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指出，中国正面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所出现的许多问题，尽管总的政策路线是正确的，但由于中国同时发展所有地区的手段尚不具备，因此，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既出于审慎，又是难以避免的。而且，技术和技巧在繁荣地区和不繁荣地区之间的流动的规模和广度也不是以消除这种不平衡。虽则报导了和跨国公司打交道的正面经验，但也不应忽视其消极方面。消极方面包括：跨国公司提供过时技术、高估外国技术的价值、低估中方在合资企业中的贡献、合同安排含混，以及中方不能参与对外营销等等。这些现象体现在许多具体事例之中。例如天津中法合营葡萄酒有限公司，武钢从日本采购设备，宝山钢铁厂，Cheng Zhou表厂，一项衬衣制造项目。不可回避的结论是，过去对西方一切都采取鄙视的态度是不明智的，现在如果对一切都崇拜；那么同样是不明智的。

闵建蜀使用PEL分析方法评价中国大陆投资环境的优势，分析了有利于吸收外国投资的五项标准——稳定性、适应性、劳动生产率、安全性和平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吸收直接投资的结构和跨国公司在华子企业行为短期化的影响，并提出改善中国PEL体制的建设性意见。

中国与跨国公司关系中的有些问题，是由于双方在法律方面缺乏彼此了解而产生的。托伯特援用中国和英国在技术转让中存在的问题，就此进行论证，相互间的了解能使双方认识到，某些

要求之所以不能满足，可能是出于法律规章上的原因。例如，美国公司一方拒绝提供银行担保，坚持技术费用支付不开列明细表，禁止采用进口技术制造的产品销往其他国家，对接管或签订合同的影响不做明确解释。这说明，双方都应认真地听取对方的要求并找出其中原因。

博瓦尼克在文章中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有些跨国公司人员在中国工作的情况听起来不仅令案例观察者惊讶，而且令中国人自己惊讶。例如维持一个美国经理人员在中国工作需要每年付出25万——30万美元的成本，这反映了对这种工作的要求和陌生的甚至糟糕的环境所致的高费用。而中国又没有自己的关于外籍人员的遴选、使外籍人员适应环境、事业管理、酬报、休假和教育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有鉴于不能把中国完全等同于其他某一发展中国家，该文建议，制定专门的关于外籍人员的政策，例如，提供支持性的有利环境，特殊的资格限定，更有力的使外籍人员适应环境和较长的任用期限等等。

跨国公司在经营中碰到的一个障碍就是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隔阂。于是，跨国公司的人才资源政策中就出现一个措施：使用华裔经理人员参与经营，这显然是克服文化障碍的一个办法。李金汉根据对香港地区对华贸易经理人员所做的调查，说明在促进对华贸易方面，华裔经理人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念祖探讨了中国同跨国公司打交道的学习曲线问题。该文归纳出一个简单道理：中国和跨国公司在彼此交往中都在曲折地前进。初始阶段发生的错误事后回想起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甚至是幼稚可笑的，看法常常以先入之见或昔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因此在说明这本论文集中的观点时，我们要记住这一点：中国正在经历着很大的变化，跨国公司也在发生着变化。双方都可能处于学习曲线的下降阶段。该文肯定了双方在学习曲线上的多方面的进步。诚然，不能认为，学习曲线的进展过程是自动地发生的，

而是需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努力。

仔细研究中国以及其他国家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并且在一起讨论，交换观点，会使双方沿着更加向下倾斜的学习曲线前进，从而获得好处。

熊性美的论文指出，在吸收外商投资时，应分析研究以下四个方面：一，统筹兼顾，整体平衡地改善投资环境；二，区分进口替代型和出口导向型企业，有计划地发展先进技术，有步骤、多渠道地解决外资企业外汇收支平衡问题；三，开放部分国内市场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关键；四，注意防止外商利用转移价格的手段损害中方利益，保证双方的合理权益。

最后一篇文章是滕维藻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与对策》，该文涉及的问题比较全面，所依据的时间背景也较近，所涉及的对策也仍然有价值，但是，世界和中国的经济都在变化，希望读者牢记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观点，以此来对待该文乃至全书所有文章。

目 录

导 言

第一编 跨国公司：理论与实践

1. 在变化的世界环境中的多国企业：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吗？ (1)
2. 跨国公司与世界经济发展 (32)
3. 内部化理论与当代国际劳动分工 (46)
4. 跨国公司的经营导向和组织 (59)
5. 信息处理技术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 (73)
6. 世界性危机与跨国公司 (88)
7. 跨国公司的投资及其对东道国的利弊 (102)

第二编 国家与国际的政策和经验

8. 技术的重大变化与世界经济新“秩序” (106)
9. 美国的跨国公司政策 (124)
10. 印度对待外国投资的政策 (136)
11. 跨国公司在泰国的技术支配 (145)

12. 匈牙利与跨国公司 (159)
13. 跨国公司行为守则、国际
 投资合同与发展过程 (165)

第三编 中国的政策与经验

14. 跨国公司与我国现代经济建设 (174)
15.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外界的看法 (184)
16. 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基本评价 (196)
17. 美中技术转让合同涉及美国法律的若干
 问题 (208)
18.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人力资源政策 (219)
19. 跨国公司华裔经理人员在对华贸易中的
 作用 (237)
20. 中国同跨国公司打交道的学习曲线 (248)
21. 上海、广州、天津和大连的外商投资企
 业：情况与分析 (265)
22.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问题与对策 (276)

第一编

跨国公司：理论与实践

1. 在变化的世界环境中的多国企业： 需要新的理论解释吗？

[英] 约翰·H·邓宁

目前，多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仍在迅速增长。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世界衰退期间，以及在近来至少某些主要工业国家恢复繁荣的期间，多国企业的总销售额——以及这些销售额中的国外部分——均超过了世界产出和世界贸易。本文将集中讨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多国企业活动方式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我们关于这些活动的理论思考所具有的意义。

一、统计回顾

在80年代初（如附录IA和IB所示），美国和英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在1983年大约6000万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累积总额中，美国的多国企业占40%，英国的多国企业占12%。但是，两国在新投资中所占份额却在不断下降。例如，1960年西德和日本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累积总额的2%，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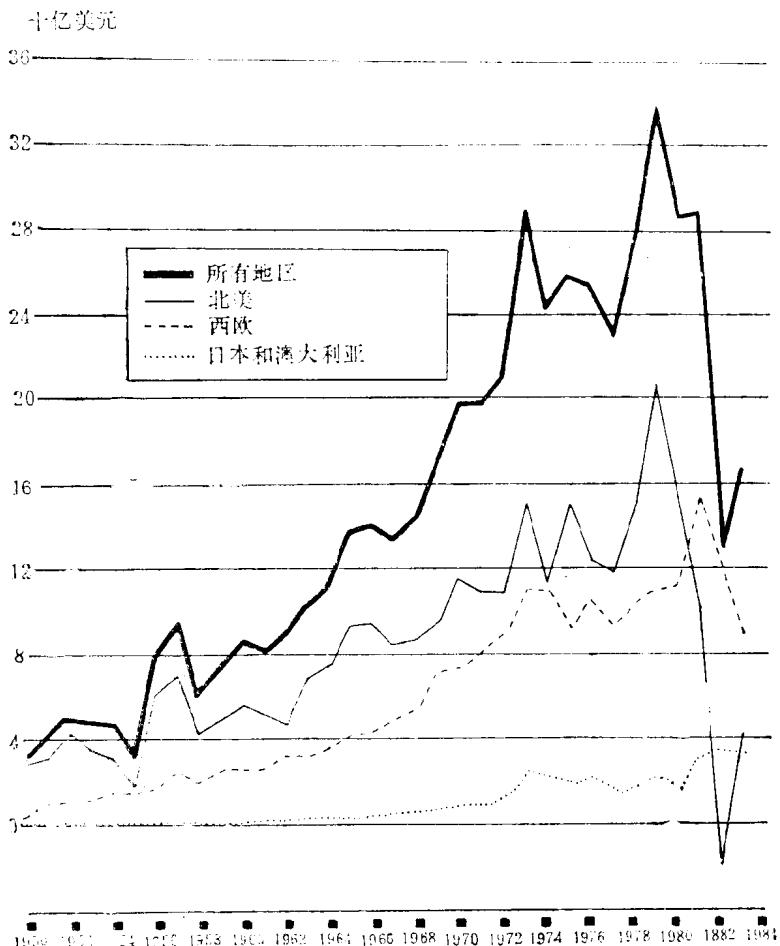
1983年这两国所占份额已增加到20%，相比之下，美国、英国、和荷兰这些传统投资国所占的份额，总计由四分之三以上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二。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一些正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国。到1980年，来自第三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印度、南朝鲜、香港、新加坡和巴西的多国企业，不仅在其它发展中国家投资了180多亿美元，也在欧洲和美国进行了投资（尤其是在技术密集的部门和服务部门）。虽然这些国家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仍然很小，但随着他们发展起自己特有的竞争优势，它们所占的份额在80年代后期将会大幅度增加。

在80年代初，新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特别是美国的）已急剧减少。其原因主要是美元升值、美国经济复苏和几个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与此同时，多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的产业内部活动（例如，在汽车、彩色电视机、轮胎、药品等方面的国际生产的交叉转运）仍在继续发展。这导致了主要资本输出国投资流入和流出的对称趋势。在60年代中期，当美国的技术和经济统治地位达到顶峰时，其流出和流入的直接投资累积总额的比率5.0。但自此以后，先是随着西德，随后是日本的发展，美国的这个比率下降了。到1985年，美国流出和流入的直接投资累积总额的比率已下降到1.30。在1975年至1980年期间，美国直接投资流入额的增长速度相当于流出额的4倍。相比之下，西德流出和流入的直接投资累积总额的比率由1960年的0.40提高到1980年的1.20，即增长了两倍。在60年代上半期，日本的直接投资流入额大约是流出额的一半，但到70年代的最后三年，这个数今已下降到刚刚超过4%。

多国企业活动的地理分布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也发生了变化。美国、西欧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亚洲（不包括印度）在新投资中所吸收的份额不断增加，而那些较为传统的吸收投资的国家

图1-1 按地区划分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1950—1983年（十亿美元，按1975年价格和美元汇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

表1-1 地区和若干国家的直接投资流出额1968-1983年

	在世界流出总额中的比重						
	1968—73	974—80	1981—83	1983	1968—73	1974—80	1981—83
	(百万特别提款权)						
所有国家	12 653	27 190	29 071	28 421	100.0	100.0	100.0
发达国家	12 576	26 746	27 529	27 520	99.6	98.7	94.7
美国	7 112	12 319	2 760	4 607	56.2	45.5	9.5
欧洲	4 422	10 674	16 749	14 488	35.0	39.4	57.6
共同体 ^a	2 352	6 054	9 246	8 302	18.6	22.3	31.8
英国	1 710	3 771	5 499	3 692	13.5	13.9	18.9
欧洲其它国家	36 1	849	2 005	2 494	2.9	3.1	6.9
加拿大	348	1 493	3 233	4 253	2.8	5.5	11.1
日本	567	1 729	3 882	3 374	4.5	6.4	13.4
其它发达国家 ^b	147	531	905	798	1.2	2.0	3.1
发展中国家	57	354	1 601	900	0.5	1.3	5.5
欧佩克成员国 ^c	25	112	1 072	387	0.2	0.4	3.7
西半球国家 ^d	17	153	262	267	0.1	0.6	0.9
非洲 ^e	5	7	17	7	*	0.1	0.1
亚洲	10	72	250	239	0.1	0.3	0.9
中东 ^d	1	8	40	-10	*	*	*
其它亚太国家	10	65	211	249	0.1	0.2	0.7
未报告流出额估计	0	0	59	1	0	*	0.2